

感傷的旅程：
在香港讀文學

陳國球 著

似秋蘭以為佩

彭脚書



臺灣學生書局印行

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

陳國球著

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

陳國球著. — 初版. — 臺北市：臺灣學生，
2003[民 92]
面：公分

ISBN 957-15-1184-6 (精裝)

ISBN 957-15-1185-4 (平裝)

1. 中國文學 — 論文，講詞等

820.7

92011751

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（全一冊）

著 作 者：陳 國 球
出 版 者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發 行 人：盧 保 宏
發 行 所：臺 灣 學 生 書 局

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

郵政劃撥帳號：00024668

電話：(02) 23634156

傳真：(02) 23636334

E-mail: student.book@msa.hinet.net

http://studentbook.web66.com.tw

本書局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

印刷所：宏輝彩色印刷公司
中和市永和路三六三巷四二號
電話：(02) 22268853

精裝新臺幣四九〇元

定價：平裝新臺幣四二〇元

西 元 二 〇 〇 三 年 八 月 初 版

82072

有著作權・侵害必究

ISBN 957-15-1184-6 (精裝)

ISBN 957-15-1185-4 (平裝)

感傷的教育

——香港、現代文學，和我（代序）

我的中學教育，是在六十至七十年代香港的「英文中學」中完成的。「英文中學」的英文原作“Anglo-Chinese Schools”，意思是為華人提供英式教育的學校。這比通行的中文名稱更能說明問題；相對於「中文中學」而言，「英式華人中學」一直是香港教育的主流（早在二十世紀初期，香港政府提供的教育當中，已有「漢文學校」和「英文書館」之分，後者的就學的人數一直比前者多），更是殖民教育或隱或顯的政策集中表現。近年來，我對文學史、文學教育與文化意識之間的關係頗感興趣。際此歷史時刻^①，友人來令叫我談談香港，並作出不得用學究式言說的規限；於是我就站在懷舊的簷緣，把舊事記憶拼貼剪輯一下，嘗試對我受過的文學教育作個粗略的掃描。

我要講的是在中學過程中我對現代文學的認識。

① 本文寫於1997年6月。



我想，「朱自清」是香港中學語文課本中一個最重要的符碼。這個名字不單止是白話文學典範的象徵，更連年累月的發揮符義功能（signification），潛移默化地模塑了在學的青少年對世界的認識。剛進中學的小伙子，誰不是在謔浪笑敖中度日呢？但同輩朋友中，沒有幾個不曾受過「一篇三下淚」的〈背影〉感染，大家在預想異日嚴父的背影，嘗試感知父子的關係有這樣溫柔的一面。小時候，我足跡所及之處，都是三合土建成的狹小空間；對於中學二年級所讀的〈荷塘月色〉，印象最深的是這些屬於「異域」氣氛的句子：「月光如流水一般，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。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。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；又像籠著輕紗的夢。……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；但光與影有著和諧的旋律，如梵婀玲上奏著的名曲。」記得老師很努力的解說甚麼是「梵婀玲」，和月光有甚麼關係。我想，老師那時應該未聽過「通感」的說法。以後，中三又由朱自清教我們觀賞藝術；老師要我們將題作〈一張小小的橫幅〉（原題〈「月朦朧，鳥朦朧，帘捲海棠紅」〉）的課文還原為畫作，還要記住當中的「淪肌浹髓」的「情韻」。此外，還有些不怎麼佔記憶的文章，如節選自《倫敦雜記》的〈倫敦動物園〉、選自《語文影》的〈論說話〉等，無聲無色的、或者不舍晝夜的，和我們渡過中學五年的歲月。到了唸大學預科班（中學六年級和七年級），還要讀〈論雅俗共賞〉一文。你說，我們和朱自清有何等密切的友誼！

這個文學世界，其基調是絕對的陰柔（feminine）。〈背影〉固然是滿紙的淚光；〈荷塘月色〉中的荷葉「像亭亭的舞女的裙」，荷花「有裊娜地開著的，有羞澀地打著朵兒的；正如粒粒的明珠，又如碧天裏的星星，又如剛出浴的美人」；〈小小橫幅〉中的圓月「柔軟與和平，如一張美人的臉」，海棠花枝「欹斜而騰挪，如少女的一隻臂膊」；這些軟綿綿的話兒，如果不是「宮體」，起碼是《花間》。是不是教育家們認為青年人太暴戾，亟需「愛的教育」？於是我們要細讀在淚痕中化解誤會的〈少年筆耕〉（夏丏尊譯，中一課文）；又看到像「白衣安琪兒」的冰心向我們「微微的笑」（〈笑〉，中一課文），和我們通訊（《寄小讀者通訊·十》，中二課文），訴說母愛的偉大。（〈母愛〉，中一課文）記得老師教同學在課堂中朗讀唯美而煽情的寫景名作〈可愛的詩境〉（易家鉞作，中三課文），讀到「我小立橋端，銷磨了幾度黯淡的黃昏，癡等新月的東升，驚醒了棲鴉之夢」、「我與她，變成了畫中的詩人，詩中的畫家；變成了燦爛的流霞，變成了團圓的明月，變成了並蒂的蓮花」時，大家都要學習陶醉於其中。

中學的課文中，也不乏〈岳飛之少年時代〉、〈祭田橫墓文〉、〈祖逖傳〉、〈大鐵椎傳〉等滿紙陽剛氣的文章，但這都是文言文；感覺上，這是古人的世界，與我們的生活隔了不止一層。我們最親近的現代文學名家，卻都是文弱、感傷的，愁腸百結、涕淚交零的。在六七十年代的我們，還只是蒙昧的少年，對人生、對未來，對香港、對中國，都只會是惘惘然的無所定向，自然未懂得思考自己的文化身分。在家、在學，就由父兄師長輩為我們指點前路；誰料，我們不知不覺間竟要延續上一代對已逝年華的感懷呢！

二

說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就像是老輩要留住已逝的韶華，不是無根的游談。由三十年代到一九四九年以前，香港的中文教材，主要來自中國內地，例如商務印書館的《現代初中國文讀本》，就是香港政府頒布的「課程標準」指定課本之一。五十年代以後，香港教育司署開始不批准學校採用大陸出版的語文和歷史教科書，改而重新編訂中文科「課程標準」（大陸已改稱「教學大綱」，香港則仍然沿用四九年前國內所用的「課程標準」一詞），再由出版商編寫課本。然而，所謂「重新」編訂，只是異乎當時中國大陸的課程，掌其事的人並沒有乘機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來配合當時當地的社會文化需求。所選用的教材，十九不離以前中華、商務、開明等課本開列的篇章。再以現代文學的範圍而論，葉紹鈞的〈蠶兒和螞蟥〉、〈春聯兒〉、〈籃球比賽〉，胡適的〈差不多先生傳〉、他所譯的都德〈最後一課〉，魯迅的〈風箏〉，周作人的〈懷愛羅先珂君〉，徐志摩的〈想飛〉、〈我所知的康橋〉，老舍的〈趵突泉的欣賞〉，巴金的〈繁星〉，許地山的〈落花生〉，以至徐蔚南的〈山陰道上〉、呂夢周的〈水的希望〉等等，就和上文提到的〈背影〉、〈母愛〉諸篇，從四十年代的中國，接枝傳承，調控著香港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的文學觀以至文化觀、人生觀。

例如：胡適的〈差不多先生傳〉，好比《阿Q正傳》的初級版，秉承五四以來知識分子對國民劣根性的反省；〈最後一課〉講國家陷敵的文化危機，也是五四救亡與啓蒙的意識的反映。朱自清的〈背

影〉講父親要在各地流離謀事；葉紹鈞的〈春聯兒〉講到老翁以大兒子抗日爲榮；巴金飄洋到法國留學，在海上每晚與繁星相對；徐志摩到英國訪羅素未遇，在康橋用長篙子撐船；這種種近代中國的人世經驗，透過老師的口講手畫，牢牢的貼在少年人的心靈深處。我們還追隨〈風雪中的北平〉（金兆梓作）、〈白馬湖之冬〉（夏丏尊作）、〈趵突泉的欣賞〉（老舍作）等言說去作文化地志的認同，認識「我們祖國」的山川名勝，這種感覺絕不是「倫敦動物園」和「康橋」一類地名所能提供的。

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，自五十年代以後香港和中國的文化聯繫未絕如線；在華人的文化場域中，不同的意識形態曾經歷一番爭逐。殖民統治者注意圍堵當前大陸的政治文化，但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傳播卻採取不干預的政策；由是，華夏文化反而可以在這片殖民地的土壤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保存下來。四九年以後，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寄蔭於香港；這一群南來的「文化遺民」，或者潛心儒學，或者薪傳五四；他們與一直根據血緣而作文化體認的本土學人匯成一種力量，在不同的教育崗位，影響了香港新生一代的文化觀念。在這裏，五四、抗日，北平、白馬湖，本是異時異域的情事，但卻一股腦兒來到眼前。爲我們講授新文學的老師，因爲直承五四遺風，所以會指出胡適是新文學運動的主要領導者，會教我們欣賞徐志摩「想飛」的浪漫；我們在課堂餘暇，可以讀多點周作人、沈從文、林語堂、梁實秋的作品。我還記得初讀趙聰《五四文壇點滴》和曹聚仁《文壇五十年》的經驗，記得買到剛出版的司馬長風《中國新文學史》上冊時的情景。這樣得來的文學知識，可能比同期的大陸學生全面；不必等八十年代以來文學史的重新書寫，才陸續興驚艷之嘆。

也因爲是五四之餘，所以我們不必如台灣學生的廢魯迅、郭沫若、聞一多不讀，也不必去猜「西諦」是誰（鄭振鐸的《插圖本中國文學史》在台出版時，作者或題爲「本社編輯部」，或作「西諦」）、不必以朱自清之名兼攝郭紹虞（郭紹虞的《語文通論》在出版時，作者名氏換了朱自清）。

三

當我們數說文學教育在香港這個借來的時空中顯出的獨特優勢，數說歷史在大陸、台灣被刻意的遺忘時，其實不必沾沾自喜。我們之能夠擁有這部分的記憶，其實也是透過另一種的遺忘去完成。

香港學生接觸到的現代文學教材，正如上文所說，大半是陰柔的浪漫，更有不少是中年人的感傷，對人生作回憶多於期盼。這種內容，大概很能配合當時老師們的感舊情懷。事實上，老師爲我們開列的課外閱讀書目當中，總少不了亞米契斯原著的《愛的教育》，夏丏尊葉聖陶合著的《文心》、《文章講話》，朱光潛的《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》等，這或許就是老師年輕時的讀物；通過師生授受，我們就活在老師的回憶之中。

在六十年代的香港，叫少年人學習回首不屬於自己的前塵，也就是對當前的情況少作聞問。在落馬洲以北，絃歌誦習的〈白楊禮贊〉（茅盾 1941 年作）、〈荷花淀〉（孫犁 1945 年作），絕不會出現於香港的課程標準。這種取捨，也是意識形態的考慮；現在看來，雖然不必就諒宥同情，但起碼可以明白了解。最令今天的我們感到失望的，是老輩們限制我們認識自己、教我們遺忘自己。

如果徐志摩的〈濃得化不開〉一類以中原心態對香港作獵奇式描畫的文本，不適宜作學校教材，我們爲甚麼不能讀施蛰存的《薄鳧林雜記》，體會一下四十年代居於香港的中國人的「抗戰氣質」？爲甚麼不讀戴望舒的《山居雜綴》，分享香港市民傍山而居，迎風冒雨的滋味？我們的老師講五四運動，爲我們分析〈答林琴南書〉，但從來不提到香港仔有子民先生的墓。我們也遺忘了葉靈鳳的《香港方物志》、《晚晴雜記》。至如許地山、蕭紅，都是遙遠的中國神話的一部分，不知道神話中竟有一角吾土。我們曉得《家》、《駱駝祥子》和《倪煥之》，就是未聽過侶倫的《窮巷》，更不要說在課本中找到《未名草》的一章半段了。

香港，我們的一代，就是這麼一個失去自己身世的孤兒。現在，又見老父輩來教我們認祖歸宗；我們的記憶，或許於大家族中話聚天倫時，不無少補；我們的失憶，正好把這段野外求生的經歷忘掉。香港，本是借來的空間、借來的時間；歷史，不屬於我們。

・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・

・ VIII ・

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

目 錄

感傷的教育——香港、現代文學，和我（代序）	I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一輯 身世兩相棄：文學史與香港

傳統的睽離——論胡適的文學史重構	3
敘述、意識形態與文學史寫作——以柳存仁《中國文學史》為例	57
詩意與唯情的政治——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	95
書寫浮城——葉輝與香港文學史的書寫	171
收編香港——中國文學史裏的香港文學	207

第二輯 涼風有信：在香港讀文學

從惘然到惆悵——試論《上元燈》中的感舊篇章	251
文本、言說與生活——《上元燈》再探	271
視通萬里 思接千載——論林庚詩的馳想	287
文學香港與李碧華	325
蒼涼的想像——談幾篇香港學者的張愛玲論文	351

· 感傷的旅程：在香港讀文學 ·

窺意象而運斤——陳炳良《形式·心理·反應》讀後	361
涼風有信——《客途秋恨》的文學閱讀	369

附 錄

創造世界——結構主義與符號學（翻譯）	391
後 記	417

第一輯

身世兩相棄：文學史與香港

傳統的睽離

——論胡適的文學史重構

「新文學運動」又可稱為「文學革命」或者「白話文運動」。每一個名稱都有其特定的指涉方向，而都是有效的。這個運動是廣義的「五四運動」的一部分。^❶「五四運動」在政治上固然有其特定的意義和作用，在社會文化各方面，亦和反權威、反傳統的精神匯流。「文學革命」一詞正可以反映當時有關文學活動方面的取向。

「文學革命」成功地推翻了傳統的文學史觀，從此中國文學真正有傳統與現代之分。在這項革命事業中出力最多，理論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適。本文試圖從主要構成觀念、建構過程的邏輯程序、造成的影響等方面討論胡適的文學史觀。在構築和檢討胡適的文學史觀時，筆者或會自居於客觀公正的立場作出褒貶月旦；然而無論從選題、徵述取捨，以至透視定點諸方面，在在顯示出筆者正被自己所

❶ 部分學者主張「新文學運動」只是「新文化運動」的一部分，與「五四運動」有關，但沒有從屬關係；胡適則選用「中國文藝復興」來代替包括「新文學運動」的「新文化運動」，他認為「五四運動」只是一項政治活動，對「新文化運動」來說，是「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」（參 Hu Shih; Grieder; 唐德剛《胡適口述自傳》174）。有關「五四運動」的廣義解釋，可以參考周策縱的討論（Chow Tse-tsung 1-6）；本文基本上採納周策縱的主張。

處的意識川流所支配。對於歷史局限的失覺與自覺，在文中潛顯不定，先請讀者鑑察。

一 「白話文學」與「文學進化觀」

胡適對中國文學發展過程的描寫，最詳盡者應是 1928 年上海新月書店出版的《白話文學史》。這本書只有上卷。胡適在〈自序〉中說：「這部文學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內繼續編成的。」⁽¹²⁾但他並沒有實踐這個諾言。《白話文學史》上卷寫到唐代韻文部分；唐代散文及宋元以後的發展都未及討論。胡適另有《國語文學史》的講稿，由黎錦熙在 1927 年出版，亦只講到南宋為止。如果我們要簡約的掌握胡適的「白話文學史觀」，可以參考他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一段簡述中國文學歷史演變的文字。⁽²⁾胡適其他論述大抵亦沒有離開這段文字的架構，故此在這裏先作引述，作為討論的開端。

首先胡適指出漢朝的「中國的古文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，政府通過舉仕的制度才「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」。「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。這二千年之中，貴族的文學儘管得勢，平民的文學也在那裏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」。以下他就將「白話文學」的發展分期敘述，並乘間與「古文文學」並論：

⁽²⁾ 本篇原是胡適為上海《申報》五十周年紀念而作的長文，收入 1923 年上海申報出版的《最近五十年》，後來由新民國書局於 1929 年出版單行本。又見《胡適文存》二：57-85；這裏的引述以單行本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為據。